

政治學研究的現況與挑戰

吳重禮*

政治學的核心是研究權力如何運作的學科，包括權力的起源、權力如何使用，以及使用權力所產生的結果，這些都是政治學者關切的課題。這種權力運作的關係，在所有人類組織中都會發生，小從家庭、班級、學校、組織、社團、公司，國內社會的新聞媒體、利益團體、非政府組織、政黨，大至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甚至於國際組織、國家與國家的互動關係等，都可以呈現權力的運作關係。

在過去十餘年來，臺灣內部局勢、兩岸關係、國際政治，以及政治學發展都面臨劇烈的變動。政治學受到其他學科的影響深遠，包括經濟學、統計學、心理學、社會學、新聞傳播的影響，使得政治學的發展呈現蓬勃趨勢。與此同時，臺灣政治學的發展受到國內外各項因素的影響，因此研究者面臨若干挑戰。對於政治學研究者和學子而言，如果我們能夠定期檢視學科發展的情形和困難，或許是頗具意義的學術基礎工作。本文希望指出目前臺灣政治學界所面臨的兩個瓶頸與困難，以及可能的解決之道。

一、中國研究的困境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個人認為，政治學者的研究對於國家發展、國家安全具有深遠影響；儘管這樣的觀點會被質疑過於本位主義，但是兩岸關係和外交政策確實是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課題。當前兩岸關係緊張的局勢，使得臺灣學界對於中國研究面臨極大的挑戰。在過去幾年來，兩岸之間的官方與民間學術交流幾乎呈現停滯的狀況，甚至彼此學人和學生往返對方國家卻遭受逮捕拘禁的狀況頻傳。兩岸的緊張局勢導致雙方學界交流互動無法順利進行，對於極度仰仗質化研究的中國研究學者面臨相當困難，只能夠依賴中國官方或者其他國家所提供的間接訊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缺乏第一手資料的取得和詮釋，將會使得中國研究的發展受到嚴重的阻撓。

*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從政治實務的角度來說，面臨美國和中國在軍事對峙、經貿競逐的國際體系中，國際情勢資訊龐雜變化之際，筆者淺見以為，兩岸之間彼此接觸進行瞭解，知悉中國政府政治菁英的思維和真實意向，以及大陸民間對於兩岸局勢的解讀，恐怕才是確保臺灣安全最重要的途徑。反過來說，雙方相互阻隔，只有可能增加彼此之間的猜忌，提升雙方誤判對方意圖的可能性，或許並不是保障臺灣安全的最佳做法。

類似的情況，我們或許可以援用研究美國種族政治（族群關係）的「接觸理論」（contact theory）學說，予以說明。在種族政治研究中，不同種族團體對於彼此的政治態度為關鍵的研究議題。諸多研究嘗試探討，在何種情況或者條件之下，人們對於其他種族團體能夠減少偏見和負面評價，提升互信程度和正面觀點，進而建立更為包容、開放的多元種族社會。

接觸理論提供種族之間消除偏見和刻板印象的邏輯推論基礎。該理論主要論述認為，種族接觸有助於降低種族偏見與敵意，當彼此合作且相互依賴時，可以促進雙方關係，使得不同種族彼此「接受」、「善意」、「容忍」，以及「和諧」程度相對提升。部分研究證實這種論點，當不同種族團體具有合作或是共同目標，藉由頻繁接觸、溝通和交流，分享共同的社會經驗，有利於形成和諧、融合、正面的種族態度。當某特定種族獲得更多關於其他不同種族的資訊，如此頻繁接觸會促使種族之間減少偏見，並開始建立關於其他種族較好的印象。學術文獻指出，民眾個人之間的接觸和互動，可以幫助人們認識和瞭解其他外部團體成員，減少負面刻板印象和社會歧視。亦有經驗研究指出，以美國社會為例，不同種族的接觸與交往，產生友誼進而瞭解彼此，有助於降低種族偏見，甚至對於不同族群產生好感。

必須說明的是，接觸理論強調並非僅藉由接觸就可以消弭族群偏見，仍然取決於種族接觸的「質」與「量」。換言之，種族接觸必須在某些「最佳條件」之下，舉例來說，在學校或工作場所中，具有「共同目標」、「團體合作」、「平等地位」，以及「權威支持」，才能夠達到消除彼此負面態度的效果。更明確地說，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當學校的教師和行政人員、工作職場的主管、族群團體的社會菁英對於種族接觸表達支持，並且對於多元種族行為有明確表達期待時，將裨益種族和諧關係的維持。

摘述西方學界發展的接觸理論相關意涵之後，回過頭來檢視該學說對於我們的若干啟示。必須說明的是，筆者深知，兩岸人民並非屬於不同種族，雙方皆隸屬於華人文化社群；而且，兩岸民眾的分隔並非文化社會的歧異，而是來自國共內戰和政治因素造成臺灣和中國的對峙。目前兩岸關係的結構背景顯然

和美國種族政治的研究脈絡有所不同，亦可能造成理論套用的罅漏，這是必須審慎關注之處。此外，筆者絕非認為他國學者所提出的觀點必然更具創見，只不過「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經由探討其他研究者的論點，應可裨益我國學者引進相關概念與分析架構，檢證相關議題。

倘若將接觸理論的觀點套用在兩岸關係的發展，可以推論以下觀點，雙方民眾加強文化交流，鼓勵民眾至對方地區進行觀光、學術界進行教育文化參訪，這些接觸頻率次數的增加將有利於鼓勵雙方的實質進展。就經濟面向而言，由於產業結構的互補性，加上彼此人文、歷史和語言的高度同質性，加速兩岸民間的經貿交流，得以提升彼此關係的整體觀感與信任。就政治角度來說，如果兩岸政府領導階層能夠暫時擱置不同的意識形態，釋出互動交流的善意，必然有助於雙方實質的發展。

當然，前述這些芻議並不是政治學界能夠解決的問題，甚至不是單方政府得以化解的爭議。然而，基於學術良知在此提醒，雙方政府或許必須審慎思考，各自抱持著雙方各持己見且彼此缺乏互信，兩岸之間互不往來可能所造成的負面效果，以及對於國家安全造成的傷害。

二、研究人才的培育和訓練

人才培育向來是學術研究備受關注的問題。一項普遍認知的現象是，學士班學生在畢業之後，首選在於赴歐美國家追求更高學位，國內碩士生在取得學位之後，若有意繼續攻讀博士學位者，首要選擇也是前往歐美國家高等學府。國內博士班學生的考量較為特殊多元，再加上缺乏歐美國家獎助學金制度，他們為了養家活口往往必須花費諸多時間在其他副業（在補習班任教是極為普遍的現象），嚴重影響學術研究的追求。如此一來，造成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窘境，即使取得博士學位之後，也不易與國外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的競逐。

約略從 2005 年以來，由於公私大學和研究機構就業市場的限制，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希望尋求教職或研究工作，經常呈現人浮於事的現象。隨著國內少子化問題益形嚴重，大陸學生赴臺灣就讀門檻提升，東南亞和其他國家學生招募呈現瓶頸，學校招生困難眾所周知。這些問題在私立學校益趨嚴重，有些私立大學的政治學相關科系進行整併，甚至遭到裁撤，原有教師另尋出路（諸如轉職至其他學校、前往中國任教、棄教從商，或者擔任博士後研究人員）的例子時有所聞。過去十餘年來，由於這些教職甄補機會的減少，使得就讀政治學相關系所博士班的人數驟減，其中願意出國留學的學生人數也呈現下降的趨勢。

然而，約略從 2020 年開始，這種人浮於事的現象開始呈現反轉。近年來隨著公私立學校資深教師陸續退休，政治學相關系所也逐漸開出若干職缺，然而因為應徵者人數過少，學術水準參差不齊，人才遞補經常無法順利到位。無疑地，造成學術人才斷層的原因很多，個人淺見以為，其中亟待強化的即是教學品質和課程內容的提升。

由於資訊與科技的進步，近年來國內與國外的政治學研究所課程更為接近，若干學子選擇留在國內繼續修讀碩士班和博士班課程。碩士班畢業生的出路較為寬廣多元，可以從事研究助理和實務路線，例如擔任國會助理、社會團體的行政工作，或者參與國家考試。相較之下，博士班畢業生比較適合從事學術研究工作，這也是博士班訓練的主要目的。如何拓展國內博士生的學術視野，目前政府相關單位已經採取若干措施，包括提高博士生獎助學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提供千里馬計畫，輔導國內博士班學生前往歐美國家進行短期訪問和博士後研究，以提升國際研究能力，汲取國際研發的經驗，立意甚佳，值得肯定。個人以為，應該多鼓勵學生在年輕階段就前往國外進修，這些在國外獨立學習的經驗，其實對於未來的教學研究工作，是有正面助益的。

除此之外，個人認為國內博士班課程應該提供更為嚴格的訓練，才足以強化博士生的學術能力。在美國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課程中，經常有一種規定，無論研究生選擇何種領域作為主修或副修課程，即使是修讀政治理論（政治哲學）和批判理論，還是必須修習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並且熟悉運用統計軟體。然而，根據個人觀察，若干國內博士生將計量研究途徑視為畏途，因此選擇無需修讀計量研究方法的其他領域，博士論文的撰寫也傾向採取傳統質化研究方法。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本人完全同意，質化和量化研究各有所長，並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重點在於能夠採取適當的研究方法，檢證研究假設和理論觀點。儘管如此，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一個不可否認的趨勢是，當前確實是以量化研究作為主流途徑，缺乏量化研究的學術訓練，經常無可避免地限制了學術出版的場域。

簡言之，建議國內政治學碩博士研究課程必須考量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列為必修課程，給予研究生更為嚴謹的學術訓練，足以提升他們在質化分析和量化研究能力，如此才得以逐步解決研究人才斷層的問題。

與前述觀點息息相關的是，若干國內博士生為了累積研究成果，為學術生涯規劃，積極地在國內學術期刊出版論文或者出版專書，這當然有利於華人學術社群在政治研究領域的對話。然而，作為學術研究工作者，個人認為，政治學的發展趨勢和經濟學、心理學愈來愈為類似，也就是說，未來學術研究成果

必定要在國際學術平臺上進行對話，接受來自世界各地學者的挑戰與評價。缺乏在國際學術社群進行對話的學者，僅能訴諸於華人學術社群顯然有所不足，這也是國內政治學博士生必須審慎留意之事。國內培養的博士生經常是人才輩出，其中就有許多是我熟識的知名經濟學者、心理學者、政治學者，他們在國際學術社群中都有極為亮麗的表現，也是國內政治學博士生值得仿效的對象。